

比况“施通格”结构引起的问题*

——兼论比较和比况

完 权

提要 科学的比较,必然是系统比较,遵守对立统一原则;而比况,则是局部比照,走向极端就是比附。在探索汉语是否具有“施通格结构”的过程中,比况会引起两方面的问题。比况“致使交替式施格”,会把致使交替误作为施格,乃至把动结式比况为致使交替,导致违背施格语言共性的问题。比况“施格性”,会误以为汉语的基础句式是 VS/SVO 格局,打乱了对汉语现存句的系统概括。面对汉语中看似施格语言的现象,应该从汉语造句系统出发,认识到以动词为核心的基本小句在汉语中并不是典型范例,汉语重视状态和事态,而非动作事件。汉语动词的及物性不明显,才会出现施受同辞这样的现象。汉语中更为本质而大量存在的句式是并置句。从演化的角度看,汉语句法保留了很多演化早期的特征,所以,在演化的晚近阶段才产生的语法关系系统,无论是施格格局还是受格格局,从系统上就都不适用于汉语分析。

关键词 施格/作格 受格 比较 比况 施受同辞

1. 导言

“区别作格语言和受格语言必须要有形态或类似形态的手段做依据。汉语没有这种形态手段,要说它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语言都只能是一种比况的说法。”(吕叔湘,1987)

“讨论汉语是施格型还是受格型,这样的比附看上去有点道理,但是总让人觉得不那么对头,给人削足适履、隔靴搔痒的感觉。”(沈家煊,2019)

吕叔湘、沈家煊二先生论述的关键,是比况或比附。这是举重若轻的说法,但其实已经掀了桌子。我们的理解是,对汉语而言,要问语法格局(grammatical pattern)是施格(作格)语言①还是受格语言,本身这个问题就已经问错了。汉语当然有自己的语法格局,但是不能局限在施格说和受格说中二选一,施受混合说也并未跳出这个局限。

本文意在沿着两位先生的道路进一步探索汉语是否具有“施通格结构”,同时反思如何应用系统比较,避免简单比况。

2. 比较才是科学研究方法

借鉴,是后发学术共同体迈向先进的必由之路。借鉴之中,必然含有比较。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中国特色概念体系的汉语对言语法研究”(23AYY005)的研究成果之一,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YS08)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重点实验室(2024SYZH001)资助。

① 本文行文中将 ergative 翻译成“施格”,在引文中则尊重原文作者的译名。

比较,是基本的思维方式,有比较才能见差异,而有差异就是矛盾,运用矛盾论辩证统一地进行比较才是科学的比较。

科学的比较,必然是对立统一的系统比较,不能盲人摸象,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能仅仅从个别事实的比较中就抽象出体系性的结论。对立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一切现象和过程中都能找到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因素,但是不能只看到有对立就匆匆得出结论,而应该依据对立统一法则,认识到对立之间的联系,在整体中进行比较,这才是系统比较。必须注意“互相联系、互起作用”,否则,会导致“简单化”“单层性”“直线性”(岑麒祥,1981:34)的错误。

语言学中的比较,包括事实比较和理论比较(桂诗春、宁春岩,1997:64)。那么,语言研究中的系统比较,就包括两个层次:语言事实的系统比较,语言学理论的系统比较。语言事实的系统比较要照顾到相关的其他事实,语言学理论的系统比较也要照顾到相关的其他理论。这两点在汉语中所谓的“施格性”问题上表现都很突出。

注重对立统一的系统比较,需要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要重视抓主要矛盾:汉语没有形态格,更没有形态作格,那么,要比较句法格局,和形态格语言相比较就不是首要任务;首先要比较的,应该是语义和语用。二要重视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汉语和外语这一对矛盾中,不能根据外语看汉语,而要立足汉语自身特点比较;否则,就是形而上学的机械比况。

比况,是拿不能相比的东西来勉强相比,单一对比不及其余,以至于牵强附会。如果不进行系统比较,即便提出再多所谓的证据,也不是有效论据。因此,Jespersen(1924:51)的论断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应该从一门语言的语法中排除其他语言所具有但在该语言中没有表现形式的差异或范畴”^②,他还引用 Sayce 的话“在英语语法中试图寻求拉丁语法的特点只能导致荒唐的错误”(Jespersen,1924:47)。同理,我们在汉语中也不能沉迷于寻求其他语言的特点。否则就只是流于比况。

3. 比况“致使交替式施格”引起的问题

3.1 致使交替不是施格

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想法,是把“NP₁+V+NP₂”和“NP₂+V”的致使交替当作施格格局,把其中的动词当作施格动词(曾立英,2009:102;蒋绍愚,2017)。典型的例子就是:

- (1) a. The man **broke** the window. b. The window **broke**.
(2) a. 水手们沉了船。 b. 船沉了。

在早期的施格研究中,确实有混入此类现象的(Lyons,1968:352),然而随后不久,学界就区分了两者(Comrie,1978;Dixon,1979:116)^③。Alexiadou 和 Schäfer(2006:41)提出,即便在这样的交替中,英语里其实也区分致使者角色和施事角色,致使者角色使用介词 from:

- (3) a. The window broke from the pressure / from the explosion / from Will's banging.
 b. *The window broke from John.

而施事角色使用 by。这个事实说明,broke 这样的词也并非施格动词,这样的结构不能归入施格格局。这就是个致使构式,施事和致使者都可以被引入外加的论元。

潘海华、叶狂(2023)援引 Comrie(1978)等观点,认为这种“词汇施格性”在所有语言中普

^② 文中多处引用外文文献,凡加引号的部分,皆作者自译。

^③ Lyons(1977:488)在探讨致使性的时候也没有出现 Lyons(1968)的观点。

遍存在,因而并不属于施格格局。此说可取。把汉语此类现象当作汉语作格性的证据实属比况。本文再增加一条论据:这种看法并不适当,关键是上位系统的错位。上述变换式反映了典型的致使交替(自动/使动交替, inchoative/causative alternation),致使交替属于语态(或“式”, voice)系统;而施格格局属于语法关系的配列(对齐)方式。

作为讨论的理论基础,本文采纳如下广为接受的观点。

关于语态:“每种语言都有一些操作用以改变小句中语义角色和语法关系之间的关系。这类手段有时被称为不同的语态。”如主动式被动式的交替,升宾式降宾式的交替等。使成式也是典型的语态变化,是一种变价操作,用于增加一个控制性参与者(Payne, 1997:169、172)。从根本上讲,致使交替是语态交替(Schäfer, 2009)。为了把不及物结构及物化,语言采用的典型手段就是致使化(Polinsky, 2005)。

关于语法格局:“语法关系经常被看作不受语义和语用影响的(或‘自主的’)语言结构层面上的论元与谓词之间的关系。”“施格/通格系统是一种将S(单论元小句中唯一论元)与P(多论元小句中最像受事的论元)^④合并而区别于A(多论元小句中最像施事的论元)的形态句法系统。”(Payne, 1997:129、143)

所以,施格语言格局和致使性分属不同的语法范畴,没有必然联系。施格格局可以不带有致使性意义,例如被广泛引用的迪尔巴尔语(Dyirbal)的例子:

- (4) a. yabu ŋuma-ŋgu bura-n
 mother+ABS father-ERG see-NONFUT
 ‘Father saw mother.’
 b. yabu banaga-n^yu
 mother+ABS return-NONFUT
 ‘Mother returned.’ (Dixon, 1994:10)

施格格局也可以使用各种致使化手段表达致使意义,包括致使交替,例如楚科奇语(Chukchi):

- (5) a. ɔtləg-e jərʔen-nin ɔʔtvʔet mimi-e
 father-ERG fill-3SG>3.SG boat.ABS water-INSTR
 ‘Father filled the boat with water.’
 b. ɔʔtvʔet jərʔet-gʔi mimi-e
 boat.ABS fill-3.SG water-INSTR
 ‘The boat filled with water.’ (Baker 和 Bobaljik, 2017:118)

楚科奇语具有形态施格,也使用致使交替表达致使意义。这说明施格格局和致使交替完全是相互独立的两类句法范畴。所以,汉语中致使交替相关的问题,需要放在语态和变价操作的议题下讨论,而不宜当成语法格局中的施格现象。当然,汉语的这类研究,在致使意义的表达方面,依然是有意义的。需要注意的仅仅是不要和语法关系的施格格局混为一谈,更不宜以此为基础进行推论。

3.2 动结式不是致使交替

有一个推论是这样的:“致动用法的双音化”+“致使交替式施格”=“混合型语言”,即认为“汉语动结式具有‘给R添加V’的形成模式,它是以表示结果的‘自动’(不及物动词或形容

^④ 有些论著使用O。本文主要使用P,在引用中保留O,并在相应的讨论中也使用O。

词)为重心所形成的”,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证汉语是一种施格受格混合型语言(石村广,2016、2019)。亦即,试图论证下面这样的例子表明汉语是混合语言。

- (6) a. 水杯打碎了。 b. 孩子打碎了水杯。

然而,这个推论导致了一个理论与事实相冲突的问题,作者本人也“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石村广,2019):一方面汉语致使/施格性由 VO 语序来表示,而另一方面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 也是定论;但是,施格语言的语序却大多是 SOV,也有 VSO,而在严格的 SVO 语言中,反倒几乎没有施格语言;那么,这个矛盾怎么解释?

本文认为,这个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推导过程中存在双重比况。一个是用动结式来比况致使交替,另一个是用致使交替来比况施格。抽去这两个比况,这个问题就烟消云散了。第二点上一节谈过了,这样的例子并非施格格局。这里单说第一点。

系统比较首先要问的是:这种现象是不是普遍现象?能不能覆盖大多数句子的语法格局?动结式中有“打碎”这样的例子不错,但是还有很多并不能进入致使交替的动结式小类,按照施春宏(2005)的分类,20 个小类中有 7 个都能找到不能进入致使交替的例子:

- (7) 主体同指 V^1+R^1 :我早就站累了。|*(?)站累了我。
主体同指 V^1+R^1 :孩子睡醒了。|*(?)睡醒了孩子。
主体同指 V^3+R^1 :孩子(问问题)问烦了爸爸。|*(?)问烦了孩子。
指动式 V^1+R^1 :我昨天下班后走晚了。|*(?)走晚了。
指动式 V^2+R^1 :我(吃晚饭)吃早了。|*(?)吃早了。
指动式 V^3+R^1 :你(教儿子钢琴)教迟了。|*(?)教迟了你。
指动式 V^1+R :老王站住了。|*(?)站住了老王。⑤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有些补语动词为一价动词的动结式小类无法进行增价操作,即无法找到致使者,或者无法通过语序变换给致使者一个合法位置。所涉类别占了三分之一强,这显然是个系统问题。可见,动结式并不等于致使结构。用动结式来比况致使交替,这样的推论过程当然值得怀疑。再加上继而又用致使交替来比况施格,自然就会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

3.3 汉语没有高度语法化的论元关系

致使交替和施格格局,都涉及高度语法化的动词核心论元关系,亦即,需要有语法上清晰可辨的主语、宾语等。然而,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讨论以来,一直没有能够在维持主语、宾语传统定义的基础上解决。这不由得让人怀疑,问题不是出在汉语语法事实上,而是出在主语、宾语的传统定义是否能够适用于汉语上。这方面的讨论很复杂,本文仅就和施格问题相关的一点进行辨析。

LaPolla(1993)拿经典的受格、施格句法模式与汉语进行比较,发现汉语与它们都不同,从而得出结论,汉语既没有受格化的语法格局,也没有作格化的语法格局,因此汉语中并不存在主语和宾语这两个句法范畴。论据之一,是并列结构的跨小句共指,例如:

- (8) a. 小狗走到山下,那个人就看见了 \emptyset 。 b. 那个人走到山下, \emptyset 就看见了小狗。

(8a)表明汉语不是受格语言,汉语允许第一小句中动词前的“小狗”在第二小句中动词后的位置上得到零形回指,这是受格语言所不允许的。(8b)表明汉语不是施格语言,汉语允许第一小句中动词前的“那个人”在第二小句中动词后的位置上得到零形回指,这是施格语言所

⑤ 根据施春宏(2005),这个不加上标的 R 代表已虚化的补语动词。动结式这个命名就意味着句法语义核心是表达结果而不是其他,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不拟进一步论证。

不允许的。因此,汉语既没有 S 和 A 的语义角色中性化,也没有 S 和 P 的语义角色中性化。所以,汉语既不是受格语言也不是施格语言。这样比较照顾到受格语言和施格语言两个方面,是系统的比较,结论可信。

但是,这一主张却受到三方面的质疑。而这些质疑,在本文看来,均不成立。

施兵(2015)认为这不过是宾语省略和共享主语现象,英语中也有,比如“I know it.”可以省略为“I know.”,所以 LaPolla(1993)的观点不成立。本文认为恰恰相反。施兵(2015)没有考虑到句法系统的整体表现,这样零星的比况才应该受到质疑。

潘海华、叶狂(2023)认为换一个角度看例(8),倒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汉语至少是宾格性与作格性共存,因此允许两种共指句式都出现,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句子中出现两种解读。”比如下面的例句都既可以理解为“那个人”滚下了山坡,也可以理解为“石头”滚下了山坡。

(9) a. 那个人把石头松开,滚下了山坡。

b. 那个人松开石头,滚下了山坡。

本文认为,所谓“宾格性与作格性共存”的说法,混淆了“分裂施格”或者“混合语言”的概念,这个概念并非说“宾格性与作格性在某个具体的句子中同时共存”,而是说“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句子中共存”。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忽视了句法施格性存在的前提是形态施格性,也忽视了句法施格和施格句法的区别,这一点罗天华(2021、2023)已经很好地作了辨析,本文不再赘述,只是想强调以下两点:第一,“仅凭语序就断言某种语言属于‘施格’语言是十分轻率的”(Dixon,1994:52);第二,即便是确证的语序施格语言,也是有形态格标记的(Payne,1997:138);受格系统和施格系统都是形态句法系统(Payne,1997:143),而汉语并没有发达的形态。坚持这两点,就不会认为例(8)反映了“宾格性与作格性共存”。至于例(8),看不出句法对语义有什么限制,因而有歧解,这倒是恰恰能够说明 LaPolla(1993)的主张:汉语对句子成分的语义角色的解读,主要是听话人根据语篇结构、语用(包括信息流、推导、关联、世界知识)而得出的主观解读。不同的解读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可以得出不同的判断,只要合乎事理,就是可以并行的解读。

潘海华、叶狂(2023)还援引 Bisang(2006),认为 LaPolla(1993)的观点“过于极端”,理由是有些结构还是说明了汉语中存在主宾语不对称,比较明确的就是句法提升和反身结构。然而,对例(8)所反映的事实,Bisang(2006)是同意 LaPolla(1993)的分析的^⑥。所以,援引 Bisang(2006)并不能推翻 LaPolla(1993)关于跨小句共指的论证。本文也认可汉语中存在主宾语不对称,但是对这种不对称的理解,更多的应放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上,而不是在语法层面上。考虑到句法提升和反身结构不是本文论题,在此不拟详论。

所以,汉语没有高度语法化的动词核心论元关系,那么用动词核心的致使交替和施格格局来套汉语现象,必然缺乏系统比较的基础,只能是一种比况。

4. 比况“施格性”引起的问题

4.1 对施格性的判定

从系统比较角度出发,对施格性的判定,应抓住语法关系的主体格局。本文采纳学界公认

^⑥ Bisang(2006)第3小节同时提出,较弱的证据还有“被”字被动句和话题提取,而不能支持汉语主宾语不对称的证据则有三个:关系小句、并列结构和话题。该文表5是这方面的总结。

- b. 看守所跑了个犯人。
 c. 前面来了个大官僚徐勉。(冯国超《中华上下五千年》)
- (13) a. 大嘴清晨醒来,发现枕边躺了个姑娘。(宁财神《武林外传》)
 b. 一辆马车驰来,车上坐了个带着两三岁小女孩的农村妇女。(《作家文摘》1994年)
 c. 走了个主管可以再招。(李可《杜拉拉升职记》)

潘叶文试图用“个”的存在证明“语序无法变换成SV”“是S与O对齐的显著特征”。然而,正是因为“个”的存在,这些句子表达了强烈的语用意义。杉村博文(2006、2010)对“个”的文化属性激活功能和语义的动态理解的研究可供参考。这些例句也鲜明表现了汉语话题在前而新信息在后的信息结构特征。

第三,潘叶文还强调这类句式覆盖了非宾格不及物动词和非作格不及物动词。然而,反例其实更多,不使用“个”的SV例句不可胜数,如(分类和例词均取自杨素英,1999):

(14) 非宾格不及物动词 SV 例

- 客体论元动词:船沉了。
 形态变化动词:雪人溶化了。(CCL·科技文献)
 存现动词:图书馆占位党消失了。(CCL·微博)
 非自主动词:五爷臭了。(乔典运《香与香》)
 时体动词:1961年的第二季度开始了。(《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

(15) 非作格不及物动词 SV 例

- 自主动词:铲土机工作了。(《现代汉语词典》)
 身体动词:小家伙睡了。(彤琤《笑拥晨曦》)

而且,其中有些例子无法变换为“V了个”句式,如“*开始了个1961年的第二季度”“*工作了个铲土机”。可见带有“个”的VS语序句不能覆盖全部类别,不是系统性语法现象,不能证明汉语具有“VS基础语序”。

第四,潘叶文还试图论证带有数量短语的VS语序也是基础语序,理由是数量短语S很难在V前做主语,而且可以更自然地出现在内嵌从句中。原文例(22)转引如下:

- (16) a. 看守所跑了两个犯人。 b. 跑了两个犯人的看守所 c. 两个犯人跑了的看守所。

语言事实确是如此。但是,如果从语用角度来进行解释,可以更加明白。“两个犯人”不宜充当主语,是因为采用了无定形式,语用上具有不可辨识性。这方面的传统研究很多。更关键的是,内嵌从句中的证据,不足以影响到基本小句的语法关系大局。

第五,潘叶文在这部分论证中引述Donohue(2008:28)试图说明“与汉语类似的也有,比如Paumarí语、Tepehua语、Mangarrayi语的作格通格对齐都是以语序为主”。不过,查考原书发现Donohue(2008)并未举出实例。并且,根据这三种语言的参考语法,Tepehua语并非施格语言^⑧,而且是形态发达的黏着语;而Paumarí语、Mangarrayi语虽然是施格语言,但是在使用语序的同时也具有形态作格。Paumarí语的形态作格标记是-a,例如:

- (17) ada ojoro-a bi-kamitha-'i-hi ida sinari bono-ni.
 DEM(M) turtle(M) -ERG 3SG.TR-hear-ASP-TH.FEM.AGR DEM(F) buriti(F) fruit(F) -FEM.POSS
 ‘This turtle heard the buriti fruit (fall).’ (Aikhenvald,2010)

^⑧ 根据Bascom(1982:274)的语法描写和Willett(1991:189-198)的参考语法,Tepehua语区分主格和宾格,并且没有证据显示出施格格局。根据Bierge(2012)的例句,Tepehua语区分主格和非主格,并且没有证据显示出施格格局。

Mangarrayi 语的形态作格标记是 *na-*, 例如:

- (18) *ŋa-gunbur* *ŋan-gawa-j* *ø-jib-ŋanju*
ERG-dust 3SG/1SG-bury-PP ABS-eye-mine
'Dust buried (i.e., blew into) my eye.' (Merlan, 1982:61)

可见,吕叔湘(1987)坚持要有形态依据,是抓住了根本,语序只是辅助。可是,也有特别执着的,比如 Zhou(1990:44)认为汉语缺乏形态标志,汉语的施格性只能从句法/语义两方面来区分。也许,这种非要拿着施格的尺子来量汉语事实的执着,才是热衷比况的根本原因。

4.3 关于“存现句”

汉语存现句和施格格局其实渺不相关。但在形式句法的非宾格假说(Perlmutter, 1978; Burzio, 1986)引入汉语研究(Huang, 1987)后,认为存现动词绝大多数是非宾格动词(也称作格动词,如 Bussmann, 1996),以至于非宾格动词和汉语存现句的关系日渐纠缠难解,比如“存现句是一种专用的、作格角度的中介句”(曾立英, 2009),“进入存现句的动词都具有非宾格性”(李莉华、熊学亮, 2020)等观点此起彼伏,引发了不少讨论。本文在此仅就系统比较方法这一议题略加辨析。

第一,把非宾格称为作格并不恰当。前者重在动词类型,后者重在语法格局。罗天华(2017)对此有详细的论说,并建议“‘施格’用于类型学,‘非宾格’用于形式语法”。罗天华(2023)强调“作格(非宾格)句法/动词实质都是形式语法的动词语义问题,不能证明汉语是作格类型语言”。这都是在维持语言学理论的系统性。否则就会平添术语使用上的烦恼。

第二,对此类现象的研究,更要进行系统比较。早期非宾格动词研究集中于存现句,如 Huang(1987)。后来的研究就渐渐庞杂起来。比如,杨素英(1999)将前人研究所涉汉语显性非宾格动词句归为四类,包括:1)不带地点的存现句(“出了车祸”);2)天气句(“下雨了”);3)不及物和使役交替句 A 类(状态变化:“火灭了一他灭了火”);4)不及物和使役交替句 B 类(空间置放:“梯子在墙上靠着—他把梯子靠在墙上”)。并特别论证了运动动词(“爬来一只乌龟”)、体态词(“他坐在床上一你在炉子上坐壶水”)和状态变化词(“船沉了”)也是非宾格动词。

但是,这样的分类,不但纳入了不同质的现象,有 VS 句也有 SV 句,有致使句也有非致使句,有存现句也有非存现句;而且也不能全部涵盖存现句,比如主宾互易存现句(如“汽车盖着雨布—雨布盖着汽车”;李宇明, 1987)。可以说,非宾格动词的引入,事实上打乱了汉语存现句的理论系统,而且也人为造成汉语中的同类现象在理论上的割裂。刘探宙(2009)就指出不能把“他们家鸡死了三只”和“他们班孩子哭了两个”这两个句法意义和构造完全一致的句子,非要说是动词类别不同、底层结构不同、生成过程也不同的现象。类型学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比况。牡丹、吴春相(2019)把存现动词分为四种类型,我们发现前三种其实具有相同的变换式,按杜、吴原文的类名排列例句如下:

- | (19) 非自主不及物动词
(非宾格动词) | 自主不及物动词
(非施格动词) | 及物动词
(通格动词) |
|--------------------------|--------------------|----------------|
| 死了一个人 | 爬着一只乌龟 | 挂着一幅画 |
| 村里死了一个人 | 地上爬着一只乌龟 | 墙上挂着一幅画 |
| 一个人在村里死了 | 一只乌龟在地上爬着 | 一幅画在墙上挂着 |

画线句是杜、吴原文的例句,其他变换式是本文的类推。具有同样的变换式,理当归入同一个大类,却被冠以不同样的三个名头,这就人为割裂了语言事实。这样的比况并不利于加深对汉语语法事实的系统认识,意味着汉语和印欧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深层差异。

5. 在系统比较中发现汉语自身的特点

5.1 基本小句不足以覆盖汉语事实

我们学习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知道了有一种语言叫施格语言,它很有特点。那么很自然,我们也会想看看汉语中有没有类似现象,然后就找到一些比较相似的表现。现在问题来了,该如何认识我们的发现?如果是就事论事点对点地比对,那就是比况,很有可能被外来理论成果蒙蔽了双眼。如果是综合考虑相关现象,系统检视相关、相近、相似、相对、相反的现象,再结合上位的、下位的现象,在整合到一起的大背景中考察,那么就可以形成系统比较的认识。

当我们看到,在语法关系的系统下,有受格语言,有施格语言,施格语言还有分裂性,还有中性语言(Comrie, 2005),我们就从中选择一个帽子给汉语戴上。这不是科学思维,这只是在做一个选择题。在西方语言学目前给出的框架下,最接近汉语事实的帽子,是给S、A和P做同样标记的中性语言,因为汉语作为形态不发达的孤立语,没有给这三个句法角色进行任何形态标记。都没有标记,就是同样的标记,所以是中性语言。然而,“成年人不做选择题”。系统比较的追求,使得我们的目光瞄向了题干——基本小句,汉语的基本小句是以动词为中心进行语法配置的吗?汉语的句子真的都有S、A和P吗?诚然,汉语有很多这样的句子,但是,也有很多不是这样组织的句子。只看到动词谓语句的考察是不全面的。汉语没有驱动语法关系高度语法化的语义语用动因,确定句法格局需要全面考察造句系统。系统考察汉语造句的格局,不能忘掉汉语里还有大量的句子不是以动词为核心的。这些句子都很难说是有一个动词核心,然后有S、A和P围绕动词核心以一定的配列形式表达特定的语法关系。独词句不涉及组合,排除在外,涉及组合而又不以动词为核心的汉语句子类型有很多。根据陈建民(1986),主要有:

(20) A. 主谓句

A1. 名词谓语句

名主名谓句:他《人民日报》,我《光明日报》。

动主名谓句:下雪大半天。/参加植树三天。

句主名谓句:我干这个工作已经十几年了。

A2. 主谓谓语句

名主主谓谓语句:老王人在医院,心在学校。

动主主谓谓语句:打篮球我不会。/叫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句主主谓谓语句⑨:药苦能治病。/奖金丢了全怪你。

B. 非主谓句

体词性非主谓句:一碟酱牛肉。/我的帽子呢?

C. 一主多谓句

无关联词语,无停顿:这个架没法儿劝。(* 这个架没法儿 / * 这个架劝)

无关联词语,有停顿:大家唱的唱,跳的跳。(* 大家唱的唱)

有关联词语,无停顿:累都累坏了。/鞋号大点就大点。

有关联词语,有停顿:爷俩又是木匠,又是瓦匠。/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D. 多主谓句

⑨ 以句子为大主语的主谓谓语句。

无关联词语,无停顿:下班我上百货大楼买件衬衣。

无关联词语,有停顿:他咳嗽他的,你睡你的。

有关联词语,无停顿:你买你就买呗。

复杂的多主谓句(流水句):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猛地滑了一跤,咔嚓一声,瓦石又碰得稀碎,水流了一地。

E. 句套子(对举格式):姜越老越辣/墙一推就倒。

以现在的理论眼光来看,基本小句无法涵盖的句子类型主要包括:名词谓语句、递系句、对举句、流水句。关键是,它们都是并置句。

除此而外,即便是汉语单动词核心主谓句,因为主谓句的实质是话题说明,也常常导致难以分析角色哪个是施事 A,哪个是受事 P。这类施受两歧的现象,在现代汉语中极为普遍。沈家煊(2019:169)对施受同辞有从古至今的全面论证。这里再补充一些典型例句:

- (21) a. 蒋介石开刀啦。(吕叔湘,1984)
b. 小偷儿给他捆起来了。(朱德熙,1982)
c. 山连山,水连水。(崔荣甫,1985)
d. 汽车盖着雨布。——雨布盖着汽车。(李宇明,1987)
e. 老王喝醉了酒。——酒喝醉了老王。(任鹰,2001)
f. 张三追累了李四了。(沈家煊,2004)
g. 甲:辛苦您!
乙:您辛苦!(微信对话)

综上,仅凭基本小句的语法关系分析,难以应付汉语中如此复杂的状况。而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汉语的动词实际上是名词的一个次类(沈家煊,2016),而名动包含的词类格局对应的则是扁平化的并置句法(沈家煊,2019)^⑩。

既然全面系统考察汉语句型显示,动词核心的基本小句无法覆盖汉语大多数句型,那么基于基本小句的宾格语言、施格语言等语法关系格局,恐怕都不是汉语语法关系问题的最优解。更明确地讲,汉语没有施格格局,不止说汉语是施格语言是比况,而且说汉语是受格语言也是比况。所以,在仅由基本小句构成的语法关系体系下看汉语,比况“施通格”引发的问题和比况“主宾格”引发的问题,二者的性质是同样的。主语、谓语、宾语这些受格语言格局内有效也有限的术语,在其经典意义上,并不真正适用于汉语。汉语不仅没有施格语、通格语,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语和宾语。甚至,汉语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动词(Jespersen, 1924:59)。所以赵元任(Chao, 1968)才说汉语的主语谓语其实是话题说明,而沈家煊(2010)论证汉语的宾语可以归入补语,都叫补足语。补足语的定位意味着汉语动宾之间的支配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的语法化,动词作为一个词类范畴没有得到充分的语法化,事件作为一个意念范畴在汉语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语法化。

倒是反过来看,从并置出发,可以解释基本小句的句法格局。“各种结构关系,包括主谓、偏正、动补、联合等,都是从指语对推衍出来的。”(沈家煊,2019:281;另可参看张伯江,2022)

^⑩ 沈家煊(2019:22-25)论证了“名动包含实质是‘指述包含’,指称语包含述谓语”,这就“意味着汉语的谓语具有指陈二象性”,“谓语根本是指称语”,那么以往所说的主谓结构其实就是“指语对”。继而又论证了“指语对”形成“不分主和从的并置对称格式,对称的并置项是互相依存的‘对等项’”(沈家煊,2019:75-77)。而并置结构是“扁平结构,不是分主从的层次结构”(沈家煊,2019:164)。

也就是说,基本小句可以视为并置句法的特例。

5.2 解释的关键:汉语造句重视状态而非动作事件

说汉语也不是受格语言,是因为从认知上看,受格语言的基本小句呈现的是一个施行事件,S和A之间的语义相似性是施事性(Payne,1997:141);但是,汉语句子所描述的核心概念不是动作事件,而是状态,或者说,汉语把事件识解为状态。

最重要的理据,是汉语动词及物性不明显。吕叔湘、朱德熙(1952:13)很早就发现“及物的动词不一定老跟着一个宾语……平常不及物的动词有时候也能带个宾语”。这说明汉语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对立不明显。沈家煊(2019:53)进一步论证,汉语动词都可以带宾语或者不带宾语,跟流水句的断连性有关。本文还可以补充一个理由:诚然,汉语是动词居中语言,但是施事受事和主语宾语并没有形成语法化的对应关系,受事主语句(22)和施事宾语句(23)都很常见,相关研究非常丰富。

(22) a. 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陈觉生,1955)

b. 肉不吃了。(詹人凤,1992)

c. 他的眉涂得黑黑的,面颊画成一副人工造作的白里透红。(陈玥,2021)

d. 二人进了地窖子门,果见有几个箱子擦在床头上,一个个搬下来打开,里头不过是些衣饰之类,也不细看。(金克中,2023)

(23) a. 出去了一个人。(孟琮等,1987)

b. 直拨电话装了一百多家。(易洪川,1997)

c. 孩子吹了凉风。(陈昌来,1999)

d.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朴珍玉,2014)

更进一步讲,汉语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对立不明显,实质是汉语动词的及物性不明显,而不可能是不及物动词的及物化。因为所谓带宾语的不及物动词,也并非把宾语加入一个及物性的事件。吴怀成、王文丽(2022)把不及物动词与非受事宾语的搭配归入施事、处所、致使、结果、受事、原因、同源、方式、时间、杂类、目的、工具、对象、等等 14 个语义类别。按照及物性的标准(Hopper 和 Thompson,1980),这些类别中动词的及物性依然非常低。所以,不及物动词后接一个名词,这个不及物动词依然是不及物动词,二者的关系只是位置上的并置。焦一和(2024)在研究“王冕死了父亲”句的时候也发现,“并不是为动词选择论元,而是为某种具有特定表达功能的结构选择动词”。这样一来,动词和所谓“论元”之间的关系,必然不那么紧密。再举一例:

(24) a. 百鸟朝凤

b. 肺朝百脉

看起来都是动词居中的双论元结构,但是二者动作方向实则相反:前者是指“所有的鸟都朝向凤凰,即朝拜凤凰”;后者是指“全身血液都朝向肺,即全身经气血液均朝会、经行于肺”,而且并无“肺使得百脉来朝”的致使意义;二者都是描述一种状态。并置结构兼容两种语义解读。所以,在这样并置形成的句法中,自然也就没有语法化了的有固定解读的立足于层级句法的S、A、P角色,更谈不上受格格局和施格格局。

汉语动词重状态而轻事件,这个特点恰巧和施格语言撞上了。施格配列的语义动因,是S和P之间在状态变化方面的语义相似性(Payne,1997:141)。潘海华、叶狂(2023)提出的6条汉语作为施格语言的证据,其实都是在论证在汉语的某些局部句法现象中,存在S和P之间在状态变化方面的语义相似性。这些证据应该放在更大的系统中进行比较,至少应该注意到:第一,都重视状态,但是动因不同,汉语是因为名动包含和并置对言,施格语言是因为S和P

之间的语义相似性,并且这个相似性是相对于 S 和 A 对语义相似性而言的;第二,反映汉语重在表达状态的现象,不只是这 6 个方面,还有其他,最典型的就是施受同辞,而这些现象并不能归入施格格局;第三,汉语重在表达状态的不只是动词,更有名词。而名词谓语句,特别是动主名谓句,就是重要证明。

具体到某些代表性句式,如何以状态说来解释?以“王冕死了父亲”为例,从状态而非事件的角度来解释可以更加明白。根据沈家煊(2006)的述评,所有涉及移位的解释都会遭遇不可解决的问题。诉诸移位,就是因为默认句子构造的核心是表达事件的动词,名词作为论元从属于动词表达事件。移位说的解释力不够,就是事件说的解释力不够。潘海华、韩景泉(2005)确认了“王冕”的话题地位,其进步性有二:一是承认了该类句式的部分构造不属于事件,“死了父亲”正是“王冕”的当前状态,二者是形式上的并置关系;二是“主谓/话题说明”关系是关乎句子结构全局的主要方面,“话题”说是摆脱事件中心论的关键一步。而沈家煊(2006)的“糅合”造句说,则彻底摆脱了事件中心论的束缚。首先在生成语法内部“否定了‘死’这类‘非宾格动词’深层无主语的属性”,确认了“父亲”是基础生成而非移位生成;其次用类推的糅合造句法说明该句式的生成过程。这个解释对破除“施格”迷信的意义在于,“死”和“父亲”之间也并无论元关系,二者也只是形式上的并置关系。

5.3 考察造句系统需要放在语言演化的大历史中

比较要放在更大的系统中,也包含有放在更大的时间系统中的意味,亦即,在语言演化的背景中进行比较。本小节谈两点。

第一,语言演化早期的并置阶段会导致看似好像施格表现的特征。

潘海华、叶狂(2023)把 VO、VS 式复合名词视为汉语作格性的表现,认为在 VS 复合词上,汉语就形成了 S 与 O 对齐的格局,体现出作格性。转引该文部分例词如下:

- (25) a. 炒饭、剪纸、推车、打手、煎蛋、烤肉、烤鱼 (VO)
- b. 死人、沉船、断桥、来信、跑车、飞鸟、爬虫 (VS)

从演化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并不稀奇。跨语言看,并置造就的复合词中常常出现类通格的现象,离心 VN 复合词中的名词都是类通格角色。其实英语跟汉语一样,都有动前名后、OS 对齐的复合名词。例如:

- (26) a. pick-pocket, scare-crow, turn-coat, dare-devil, hunch-back, wag-tail, kill-joy (VO)
- b. rattle-snake, catch-phrase, cry-baby, stink-bug, worry-wart, tumble-weed, scape-goat (VS)

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英语就是施通格语言。同样,(25)这种所谓的 SO 对齐也不能说明汉语的作格性。从演化的角度来看,Progovac (2015)认为这属于语言演化早期并置阶段的遗存现象,反映了动词与其相关名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尚未确定,不区分是 O 还是 S。汉语这类现象比英语更加丰富,这说明汉语的结构关系更是并置为本。

其实,这个“对齐”跟是 O 还是 S 毫无关系,这是汉语复合名词构词的必然。汉语复合名词,当然是名词作为核心居后,炒饭是一种饭,沉船是一种船,跑车是一种车,名词性成分总是在复合词的后面,动词定语后的名词中心语是 O 还是 S 都有可能,那么自然也就“对齐”了。

第二,汉语动词低及物性的特征,也是语言演化早期阶段的特征。

在当代语言的演化中,我们能观察到这样的演化过程,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Kegl 等(1999:216-217)所描写的尼加拉瓜聋人儿童使用的手语。在尼加拉瓜手语形成的早期阶段,它的第一代使用者,并不使用及物性的 NVN 构式,例如(27),至少在两个名词都具有有生性

的时候不使用(Senghas 等,1997)。他们的表达方式是使用两个不及物小句并置构成的序列,即 NV-NV 序列,例如(28)(大写字母英文单词表示手语动作):

(27) * WOMAN PUSH MAN.

(28) WOMAN PUSH—MAN FALL.

他们不用手势比划“女推男”这样有三个动作单位构成的句子,而是连续比划两套动作,“女推”“男倒”,以 2×2 并置关系(沈家煊,2019:226)的两个不及物结构,表达一个及物结构的意义。“推”这个动作对“男”的及物性支配和影响,是交际双方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推导出来的,是语用推理的结果。这不是孤例。据 Aronoff 等(2008)报道,在贝都因大师手语(Al-Sayyid Bedouin Sign Language,一种在以色列使用的哑语)约 70 年的发展史中,也有同样的现象:一个谓语一个论元,用两三个这样的小句表达一个及物性事件。

如果手语的演化和有声语言的演化有共性的话,那就说明,及物性这个语法概念是后起的,并且,在及物性概念产生以前,是使用并置关系引发语用推理来作为及物性概念的前身。而如果承认汉语的主谓关系就是话题说明关系的话,这也是并置。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看,汉语的单论元句和双论元句(如果我们不放弃这些术语的话),其内部组成都是并置。对并置结构的语义解释,并不依赖于语法关系确定的语法意义。

确定了汉语处于句法演化的早期,那么,就应该更加重视汉语语句的扁平化分析。很多学者提出早期句法是松散连结。Jackendoff(1999、2002)提出,扁平短句不仅是句法演化的曾经,并置语法比层级语法初级,而且也是现代语言的活化石。他认为并置作为前一阶段的成果依然存在,和更加复杂的层级结构并存,并置化石结构被建在每一个现代小句或短语的非常基础的部分,比如复合词和衔接操作。在汉语句法研究中,沈家煊(2019)和张伯江(2021)都展示了并置结构扁平化分析的范例。零句和流水句作为汉语造句法的核心句式,正是汉语句法保留了很多演化早期特征的证据^①。所以,在演化的晚近阶段才产生的基本小句概念、单句概念,以及与之伴随产生的主谓结构(沈家煊,2018)、受格格局和施格格局等等,从系统上看,就不适用于对汉语的分析。那么基于这些概念的所谓比较,也就只能是比况。

6. 结论和余论

不可否认,汉语中有一些零星的仿佛反映了“施格性”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抓住个别现象就匆匆得出结论,这就和摸着大象腿就说大象像柱子一样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系统比较,不局限于所谓“施格动词”,还要扩大一点看“施格格局”是否存在,再扩大一点看“施格格局”“受格格局”“中性格局”等各种配列方式是否在汉语中有其对应物,再扩大一点就要看汉语中的句子是否都是基本小句,乃至再扩大一点,在演化的系统中,看汉语处于哪个分支的哪个阶段。^②把大象的腿、鼻子、耳朵、尾巴和身体都摸一遍,还要再摸摸其他动物,这样的比较,才是系统比较。正如 Jespersen(1924:51)所言:“把每一个语言现象看作与其他现象

^① 还需要打破的一个观念是单线条演化说。从简单到复杂、从并置到层级的演化,Progovac(2015)建立了一个单线条演化模型。然而从汉语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论证,汉语从并置阶段起,就走在从简单并置到复杂并置的演化道路上,而不是从并置到层级的演化。后一条道路是大家熟悉的形态发达的语言的语法化路线。而汉语,显然不是走在形态演化的道路上。语言演化就像生物演化,不是单线条的,而是一棵演化树。沈家煊(2019:81)提出语言演化出现分叉,对言的格式化是汉语的“语法化”。

^② 关于语言演化树和英汉“流水句”对比,我们将分别另文阐释。

无关,这样的孤立研究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整体。”

取“施格”^⑬译名对应 ergative 也是从系统着眼。吕叔湘(1979)论述过“主语”“宾语”并不是一组相对待的概念,沈家煊(2010)论述过“宾语”归入“补语”,这就取消了“宾语”的术语地位,那么与“宾语”相配的“宾格”最好就翻译成和“受事”相配的“受格”。施受相对,那么配合“施事”的“施格”就成了比较合适的译名了。

参考文献

- 岑麒祥 1981 《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
- 陈昌来 1999 《论现代汉语句子语义结构中的施事》,《吉安师专学报》第2期。
- 陈建民 1986 《现代汉语句型论》,语文出版社。
- 陈觉生 1955 《关于“受事主语”》,《文史哲》第9期。
- 陈 玥 2021 《受事主语句“V得”句的语义功能及成立条件》,《汉语学习》第1期。
- 崔荣甫 1985 《试谈同语施受句式——兼与史荣光同志商榷》,《修辞学习》第2期。
- 杜 丹 吴春相 2019 《从分裂施格现象看汉语存现句的类型特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4期。
- 桂诗春 宁春岩 1997 《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蒋绍愚 2017 《上古汉语的作格动词》,《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一辑),商务印书馆。
- 焦一和 2024 《“父亲”“客人”与汉语中的“有无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学沙龙第368次。
- 金克中 2023 《语法手段全量的受事主语句的历史演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李莉华 熊学亮 2020 《也谈汉语存现句中动词的非宾格性》,《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李宇明 1987 《存现结构中的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
- 刘探宙 2009 《一元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现象》,《中国语文》第2期。
- 罗天华 2016 《施格语言的语序》,《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4期。
- 罗天华 2017 《类型学的施格格局》,《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4期。
- 罗天华 2021 《汉语是作格语言吗?——作格格局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当代语言学》第1期。
- 罗天华 2023 《汉语是句法混合型语言吗?》,《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3期。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84 《歧义类例》,《中国语文》第5期。
- 吕叔湘 1987 《说“胜”和“败”》,《中国语文》第1期。
- 吕叔湘 朱德熙 1952 《语法修辞讲话》,开明书店。
- 孟 琮 郑怀德 孟庆海 蔡文兰(编) 1987 《动词用法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 朴珍玉 2014 《现代汉语施事宾语句与基本句的偏离研究》,《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第4期。
- 潘海华 韩景泉 2005 《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的句法研究》,《语言研究》第3期。
- 潘海华 叶 狂 2023 《汉语真的不是作格语言吗?》,《语言学论丛》第2期。
- 任 鹰 2001 《主宾可换位动结式述语结构分析》,《中国语文》第4期。
- 杉村博文 2006 《量词“个”的文化属性激活功能和语义的动态理解》,《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杉村博文 2010 《现代汉语量词“个”的语义、句法功能扩展》,《语言学论丛》(第四十辑),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04 《动结式“追累”的语法和语义》,《语言科学》第6期。
- 沈家煊 2006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中国语文》第4期。
- 沈家煊 2010 《如何解决补语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沈家煊 2016 《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

^⑬ 朱晓农(2003)对“施格”译名有很好的解说。

- 沈家焯 2018 《比附“主谓”结构引起的问题》,《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6期。
- 沈家焯 2019 《超越主谓结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商务印书馆。
- 施兵 2015 《主语范畴存在之辨:与罗仁地商榷》,《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第11期。
- 施春宏 2005 《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过程及相关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石村广 2016 《动结式的致使意义和使动用法的双音化》,《当代语言学》第3期。
- 石村广 2019 《汉语动结式在语言类型上的两面性——从藏缅语的自动和使动的对立谈起》,《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吴怀成 王文丽 2022 《不及物动词宾语的语义类型和构式语法阐释》,《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第6期。
- 杨素英 1999 《从非宾格动词现象看语义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当代语言学》第1期。
- 叶狂 潘海华 2017 《从分裂作格现象看汉语句法的混合性》,《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易洪川 1997 《汉语口语里的一种施事宾语》,《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曾立英 2009 《现代汉语作格现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詹人凤 1992 《受事主语句(名—动式)的识别》,《语法研究和探索(六)》,商务印书馆。
- 张伯江 2021 《复杂句式的扁平化——纪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中国语文》第1期。
- 张伯江 2022 《现代汉语语法关系的推导》,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十一届学术年会。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朱晓农 2003 《谈谈调查太平洋岛施格语的学习体会》,戴昭铭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0 Gender, noun class and language obsolescence: The case of Paumarí. In Eithne B. Carlin and Simon vande Kerke (eds.), *Linguistics and Archaeology in the Americas*, 235–252. Leiden: Brill.
- Alexiadou, Artemis and Florian Schäfer 2006 Instrument subjects are agents or causers. In Donald Baumer, David Montero and Michael Scanlo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40–48.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 Aronoff, Mark, Irit Meir, Carol Padden, and Wendy Sandler 2008 The roots of linguistic organization in a new language. *Interaction Studies* 9(1): 133–153.
- Baker, Mark C. and Jonathan David Bobaljik 2017 On inherent and dependent theories of ergative case. In Jessica Coon, Diane Massam, Lisa DeMena Travi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rgativity*, 112–1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scom, Burton W. 1982 Northern Tepehuan. In Ronald W. Langacker (ed.), *Studies in Uto-Aztecan Grammar, vol.3: Uto-Aztecan Grammatical Sketches*, 267–393.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Bierge, Stefanie Ramos 2012 From demonstrative to nominalizer: The suffix -gai in Northern Tepehuan.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38: 432–446.
- Bisang, Walter 2006 Widening the perspective: Argumenthood and syntax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Tagalog. In Daniel Hole, André Meinunger, Werner Abraham (eds.), *Datives and Other Cases: Betwee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Event Structure*, 331–381.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urzio, Luigi 1986 *Italian Syntax: A Government-Binding Approach*. Dordrecht: Reidel.
- Bussmann, Hadumod 1996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78 Ergativity. In Winfred P. Lehmann (ed.), *Syntactic Typology: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n of Language*, 329–394.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Comrie, Bernard 2005 Alignment of case marking. In Martin Haspelmath, Matthew Dryer,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398–4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1979 Ergativity. *Language* 55(1): 59–138.
- Dixon, R. M. W. 1994 *Erg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nohue, Mark 2008 Semantic alignment systems: What's what, and what's not. In Mark Donohue and Soren Wichmann (eds.), *The Typology of Semantic Alignment*, 24–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T. James 1987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Chinese and (in) definiteness. In Eric J. Reuland and Alice G. B. ter Meulen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 definiteness*, 226–25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opper, Paul J.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2): 251–299.
- Jackendoff, Ray 1999 Possibl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capacit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3(7): 272–279.
- Jackendoff, Ray 2002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Brain, Meaning, Grammar,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espersen, Otto 1924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Kegl, Judy, Ann Senghas, and Marie Coppola 1999 Creation through contact: Sign language emergence and sign language change in Nicaragua. In Michel DeGraff (ed.), *Language Cre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reolization, Diachrony, and Development*, 179–23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aPolla, Randy 1993 Arguments against 'subject' and 'direct object' as viable concept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 759–813.
- Lyons, John 1968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rlan, Francesca 1982 *Mangaray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Payne, Thomas 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rlmutter, David 1978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4: 157–189.
- Polinsky, Maria 2005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In Martin Haspelmath, Matthew S. Dryer,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442–4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ogovac, Ljiljana 2015 *Evolutionary Synta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äfer, Florian 2009 The causative altern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3(2): 641–681.
- Senghas, Ann, Marie Coppola, Elissa L. Newport and Ted Supalla 1997 Argument structure in Nicaraguan Sign Language: The emergence of grammatical devices. In Elizabeth Hughes, Mary Hughes and Annabel Greenhil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Bos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21*, 55–561. Boston: Cascadilla Press.
- Siewierska, Anna and Dik Bakker 2009 Case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Word order and agreement marking. In Andrej Malchukov and Andrew Spenc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se*, 290–3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ett, Thomas L. 1991 *A Reference Grammar of Southeastern Tepehuan*. 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Zhou, Xiping 1990 *Aspects of Chinese Syntax: Ergativity and Phrase Structu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完 权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料库暨计算语言学研究中心
wanquan@cass.org.cn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rch, 2025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CHENG Chunhua, Chines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hines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policy (CNCLP)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ustained prosper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CNCLP, deeply rooted in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the whole country”, has undergone several phases since the Xia dynasty.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tinuity, innovation, un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ful na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NCLP fosters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olsters national cohesion, and maintains national unity. It ha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fiv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the *Pinyinization* (phoneticization) as well as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ommon language have introduced new ways of consolidat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and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Keywords: common language policy; common language; national language;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SHI Youwei, A tentative study of Yuen Ren Chao’s thoughts on *zi* (字) and *ci* (词)

Yuen Ren Chao has offered abundant discussions on the *zi* (字) and *ci* (词) in Chinese linguistics. Through a scrutiny of his later works, this paper summarizes Chao’s contemplation of *zi/ci* into three phases: morphemes/independent words, sociologically associated words or syntagmatic words, and word-syllable or structural/non-structural words. The later phases are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y reflect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notions. The multiple syntactic units in Chao’s system manifest themselves as a continuum. On the vague boundary between *zi* and *ci*, Chao’s analysis suggests that *zi* is the core on rhythm while *ci* plays the major role on syntax. The division of functions between *zi* and *ci* on rhythm and syntax indicates that both of them are of equ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Yuen Ren Chao’s academic thoughts; Chinese (*Hanyu*, 汉语); *zi* (字); word-syllable; *ci* (词); syntagmatic words

WAN Quan, Problems caused by modeling Chinese on the ergative-absolutive pattern: Comparing or modeling

Scientific comparison is inevitably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opposites. Modeling, on the other hand, refers to strained comparison, which is far-fetched in extreme cases. When discussing whether Chinese has an ergative-absolutive pattern or not, modeling leads to two problems. Firstly, causative alternation can be mistakenly regarded as an ergative pattern when modeling it to the ergative pattern in the sense of Lyons (1968). Even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can be mistaken as some kinds of causative alternation, which

violates the universals of ergative languages. Secondly, modeling Chinese on the ergative-absolutive language may lead to a wrong viewpoint that the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of Chinese is VS/SVO. This would go against the systematic generalization of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s. Concerning the seemingly ergativity in Chines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system of Chinese syntax and recognize that basic clauses with a verbal core are not necessary in Chinese. Instead of actions, states and situations are especially valu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overt feature of verb transitivity in Chinese causes the agent and patient to be identical in form and most Chinese sentences are in essence juxtapositional.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many features of historical Chinese have remained in modern Chinese which cannot be properly accounted for by modern grammatical systems.

Keywords: ergative; accusative; comparing; modeling; identical agent and patient

YUAN Dan and CHEN Yiya, Tonal F0 splits in Qidong Xiang dialect

Based on Growth Curve Analysis (GC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exical tone f0 patterns in Qidong Xiang dialect, mainly on syllables with sonorant, voiceless unaspirated, and voiced onsets across two generations. Statist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for MC level tones, both older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exhibit f0 differences among syllables with all onset types. For MC rising tones, older generation maintains f0 distinctions while younger generation shows a merge of syllables with sonorant and voiceless unaspirated onsets. For MC departing and entering tones, both generations exhibit a merged f0 pattern following sonorant and voiceless unaspirated onsets while retaining distinctions after voiced onset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f0 splits in level and rising tone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may have originated from a “voiceless-voiced” dichotomy, with raised f0 after sonorant onsets. The merge of rising tones with different onsets i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internal raising of sonorant onset f0 and external lowering of voiceless unaspirated onset f0. Additionally, som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exhibit a merge of level and entering tones after voiced onsets, forming a distinct category of level tone after sonorant onsets.

Keywords: Growth Curve Analysis; experimental phonetics; Qidong Xiang dialect; sonorant; tonal f0 split

ZHU Chenlin, The plosive feature of nasal initials in Jianghuai Madarin of central Anhui Province

Nasal initials [m n ŋ] in Jianghuai Mandarin of central Anhui Province have certain plosive featur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sal+stop” structure of [m n ŋ] and proposes that they are rather [m^b n^d ŋ^g] which are more likely to appear before high vowels. Among the three, [m^b] is derived from MC *ming* (明) group initials; [ŋ^g] came from MC *ying* (影)/*yi* (疑) group initials; [n^d] is mainly derived from MC *ni* (泥)/*lai* (来) group initials. Affected by the apicalization of high vowels, three variants of [n^d] occurred following the path of evolution as [n^d] → [n^{dz}] → [n^{dz}]. Hence, the [m^b n^d ŋ^g] in Jianghuai Mandarin of central Anhui Province are results of natural sound change rather than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Chinese.

Keywords: Jianghuai Mandarin; nasal initials; plosive feature; sound change

SUN Zhibo, Language evolu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Wuhan diale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Based on investigations of the rhyme book *Tongsheng yunxue bianlan* (同声韵学便览),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t documents the Wuhan dialect of late Qing dynasty instead of the Hefei dialect. Romanized spellings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terials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can also provide evidences for the complicated diachronic change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Wuhan dialect. Internally, *tʂ- would shift into *ts- when combining with *Neizhuan* (内转) rhymes; *-u- would be dropped after acute consonants of *Zhi* (止), *Xie* (蟹), *Zhen* (臻) and *Shan* (山) rhymes; and *u would become *ou after acute consonants in *Yu* (遇) rhymes. Externally-induced sound change involves those in the third division of *Jia* (假) rhyme and words of unrounded articulation with *Ri* (日) initials. The